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六九期 ——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4e)

【往事追忆】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戴维堤
【人物追踪】造访戚本禹	weihong
【书刊评论】吴法宪突破崇毛禁锢	金 钟
【痛定思痛】什么叫“群众专政”？	邵燕祥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追忆】

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 戴维堤 •

我与蒯大富相识，始于1966年10月6日。那天，在工人体育场“全国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周总理刚给我平了反，我在主席台后排认识了蒯大富。当天晚上，应当时国务院某领导之女——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周某某之邀，蒯大富拉我一块去了一趟天津“煽风点火”。这次天津之行未干什么坏事，实话实说。

蒯和我都是周总理平反的红卫兵头头，但蒯大富在清华比我“折腾”得厉害，挨整也比我厉害。由于我后来很快“让贤”，韩爱晶接班，所以蒯大富、韩爱晶名气比我大得多，后来挨的整也比我厉害得多。这是历史老人的安排，没有办法。

蒯大富是江苏盐城滨海人，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共产党员，父亲是村支书。他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工系，与我同年进京并有类似的经历。

文革之初，蒯大富因反工作组被打成反动学生，这点与我也相似。只不过我被逼得写了血书，蒯大富被关押十八天，逼得绝食抗争并在清华园附近卧轨自杀未遂。

1966年6月8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便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不久，教育部把蒋南翔“抛”了出来，蒋成了“黑帮”。6月12至16日四天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清华大学便有103名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112人被打成走资派，16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

以上这些，不管是功劳还是错误，都是工作组干的，没有蒯大富的份。

6月15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十几名学生带头反工作组，很快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闹得比北航厉害，这是因为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有一个特殊身份的顾问王光美，而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因此蒯大富的造反和清华文革的情况随时“通天”。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事实上是对着他来的。他天真地认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你们问我，我也不晓得。毛泽东点燃了文革烈火后，就到南方“巡视”去了，让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和老邓按照毛泽东历来的经验，派出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而这些工作组成员都是从党、政、军各领导机关临时抽调来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同样一问三不知，很不理解。工作组长们（包括北航赵如璋）都是老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他们都参加过。特别是反右斗争，他们有丰富的经验。那时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一样，是不允许人们对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人、甚至基层支部书记说个不字的。谁敢说个不字，谁敢提意见，那就是反党，就是别有用心，就要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反右派问题上观点一致，没有分歧，英雄所见略同。“反右”运动中，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就把多少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了右派分子——包括后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

据说当时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曾举着“宪法”游行，请毛泽东的领导人按宪法办事，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照样把他们打成右派。后来刘少奇同志挨整时，也想起了宪法，但已经晚了。

这一次，老皇历不灵了，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项庄舞剑，刘少奇不知自己成了沛公。他又经验主义地把反工作组的学生视为右派、“游鱼”、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支持王光美同志和工作组狠狠地整。于是蒯大富等数百名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师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蒯大富被开除了团籍，关押了十八天。他曾绝食抗议工作组并“逃跑”到清华园车站卧轨自杀未遂。另一个学生被整死了。

当时清华大学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游鱼”的教师学生达八百多人，而北航工作组“小巫见大巫”，才整了一百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才十几个人。

笔者至今不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革命行动，是符合宪法的。有人至今把工作组当年整学生、整干部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应该的，这似乎不对，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穿了叫做不讲理或以势压人。说工作组有错误，这同否定文革不矛盾，何况这是历史的事实。以北航为例，是工作组首先把党委正、副书记打成“黑帮”，交学生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又把矛头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学生。这点，北航有良心的老人们都可以作证。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工作组也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组的错误有上面的责任，也有自己的责任，这不必回避。

如果说文革初工作组大整干部群众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可以理解和谅解，那青年学

生红卫兵造反派们是不是“小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呢？后来为什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三种人”，而且至今不能原谅呢？

如果说蒯大富等人后来犯了错误，犯了罪，挨整、判刑甚至杀头是罪有应得，那也不能把当年工作组整干部、整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给蒯大富定案的时候，也没有反工作组这一条。

笔者认为，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教训，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说是无法无天的话，首先是工作组无法无天，然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无法无天，最后才是红卫兵造反派无法无天。是工作组先把老干部打成了“黑帮”，又把给他们提了点意见的群众——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和干部打成了反革命，批斗，关押，迫害，剥夺人权。后来红卫兵造反派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号召、支持甚至煽动下，也无法无天起来。他们中的某些人走向了反面，搞“打、砸、抢”，批斗、迫害所谓的走资派们，搞得天下大乱。笔者坦言，文革十年（当然包括后期历时数年的抓“5.16”运动）完全是一笔糊涂帐，除了极少数真正的逍遥派外，谁都挨过整，谁都整过别人，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一贯正确，谁也别装孙子。

书归正传。据说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第一次到清华园见到蒯大富时，指着蒯大富的鼻子骂道：“你就是快大富？你不但要富，还要又快又大，听你这个名字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反工作组大闹清华园的行动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了反。1966年9月24日，蒯大富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自任司令，后来又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以反刘少奇和批斗王光美而名扬全世界。

清华大学的学生脑子聪明，胆子也不小，包括揪斗王光美和后来的大武斗，清华园的许多高智商亡命之徒令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叹弗如，望尘莫及。

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1964年访问印尼时，一反在国内的朴素形象，穿了旗袍，戴了项练，风采照人。这本是外交礼仪需要，绝对有大国领导人夫人的风度，更谈不上给中国人丢脸。如果说对王光美同志有意见，认为她有错误，不该穿旗袍、戴项链，批评王光美的错误似乎也可以，但不能侮辱人格，搞恶作剧。结果，在中央文革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指使下，蒯大富的人经过密谋，干出了文革中轰动全国、全世界的“精彩之笔”。为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蒯大富的人以刘少奇子女遇车祸为诱饵，把刘少奇夫妇骗到了医院。经周恩来的干预和批准，刘少奇返回了中南海，但王光美可以到清华园接受批判。于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给王光美套上了花床单做的旗袍，戴上了乒乓球做的大项练，进行批斗。当时我和韩爱晶等人在北航听去参加会的学生回来一说，感到很好笑。韩爱晶不以为然地说：“蒯大富这种搞法，纯粹是恶作剧，太不严肃，容易让人家抓辫子。”

王光美同志当时受到了奇耻大辱，换任何一个人，也不会饶恕蒯大富和造反派们。王光美同志后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多年，九死一生，受尽了苦难，并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这是中国文革中的大悲剧。多年之后，王光美见到了曾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的王力，她热情地握着王力的手说：“你也是受害者，你当了替罪羊。”其宽大的胸怀令人感动。

有人抛开政治评论王光美和江青时说，一个是大家风范，一个是小肚鸡肠；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是村野女子；一个是燕京大学的校花，一个是上海滩的“戏子”，其家庭环境、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决定了两个女人的天壤之别。

1967年4月14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414”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414”同时抛出了一份后来被陈伯达称为很有理论水平的宣言书——“414思潮必胜”，其作者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414的理论家”的周泉纁。

当时有人向我报告说清华大学出了一张很厉害的大字报，我立即去清华园详细地看了周泉纁的大作。他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醒，只可惜我当时的思想不能接受。我在佩服周泉纁的才华和文笔的同时，认为他是个危险的一定要倒霉的人物，是一个高水平的造反派的叛徒，将来很可能成为曾国藩式的人物，蒯大富很可能“死”在他们一些人的手里。

所谓“414思潮”，大意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414”思潮认为，像蒯大富之类的造反派是“形左实右派”，是一帮“流氓、痞子、土匪、叫化子”，只能让他们帮着造反打江山，不能让他们坐江山。为了防止他们将来犯上作乱，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杀掉。这些观点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泉纁后来又因反陈伯达被关押了一年多，毛泽东知道后，下令把他释放了。

多年之后据周泉纁自己说，他当年拿蒯大富和陈伯达开刀，就是要将毛泽东的军，逼迫毛泽东“改弦更张”。

文革中的“414”思潮或观点，是一个非常深奥和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4.14”思潮和理论绝对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从历史的实践看来，“414”思潮却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开始几乎都是“痞子”搞起来的。这些先天不足的“痞子”们打江山时绝对是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懂得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只知道打倒皇帝做皇帝。一旦胜利在望，“痞子”的劣性便暴露出来，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甚至为了个女人而大打出手，最后以失败告终。李自成、太平天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看来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毛泽东刚开始革命造反时，不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骂为“土匪”、“痞子”吗？

笔者坦承，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头头（包括本人在内）都不能说是真正的革命者，大部分是“痞子”或身上有“痞子”气。但是，什么人身上没有“痞子”气呢？大概是那些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人们和忠厚老实、明哲保身、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和逍遥派吧？但是，若说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栋梁，笔者至死不敢苟同。（注：真正有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和独立见解的所谓逍遥派除外。）

古今中外，历代皇帝和统治者都是“痞子”变化来的。当了皇帝的“痞子”对帮助自己造反打江山的“痞子”大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割地封侯，委以重任，二是当替罪羊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痞子”教育、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统统当替罪羊杀掉。可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最后还是上了“4.14”的当，重蹈了某些历代皇帝的覆辙。

历史无情地把周泉纁的预言变成了现实，“414”胜利了，“414”的遗老遗少们得到的是“顶戴花翎”，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之流一个个变成了阶下囚。这是后话。

当时，蒯大富等人对“414思潮”恨之入骨，同“414”造反兵团势不两立，两派整天互相攻击、对骂，不共戴天，把个好端端的清华园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蒯大富的“井冈山”和“414”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清华大学的大联合一直无望，成立“革委会”也就成了泡影。有一段时间，联合似乎有望。周总理表示，只要清华大学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他一定出席祝贺。蒯大富十分高兴，请“林副主席”为清华革委会成立题词。林彪很聪明，他对清华大学革委会只字未题，他题的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林彪题字的“四个伟大”的由来。

蒯大富的命运本来应该不错，只要他同“414”联合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周总理一出席，中央一支持，清华大学将是蒯大富的一统天下，象北航一样。可惜沈如槐、周泉缨等人早已看准了这步棋，故意搅乱了蒯大富的黄粱美梦。笔者认为，如果当时清华大学很快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就不会发生武斗。没有武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和必要）派工人、解放军去“占领”。这样，蒯大富等人就不会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的命运和历史起码要延长，甚至文革的历史要重写。这是鄙人一孔之见。可惜，这个本来可以出现的局面被“414”的好汉们击得粉碎。用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周泉缨的“4.14思潮必胜”大字报改写了中国文革的历史。

历史的悲剧在于，蒯大富等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414”的当，把“414”和“地派”当成了最危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从而大加讨伐，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武斗。历史证明，头脑聪明但利令智昏的蒯大富等人不是“414”的对手。他们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在为“4.14”思潮验证真理：造反派就是只能造反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也！不能坐江山也无所谓，关键是差点丢了吃饭的家伙——脑袋，并且“连累”了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

1967年4月底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清华“414”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

清华“414”当时对北航红旗应当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知道我们和蒯大富关系不错，请我们出面给蒯大富作作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414”几个“议员”名额。

“414”的头头说得怪可怜的，我很理解。于是我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414”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414”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4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老佛爷”聂元梓如出一辙。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1968年的夏季，清华、北大的武斗达到了高潮。两派的头头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令所有的人非常头痛。谢富治曾带领我们北航的头头们去清华一次，想制止武斗，结果进不了封锁区，扫兴而归。中央文革、周总理也没有办法，直至后来惊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

打倒“四人帮”之后，蒯大富、聂元梓等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表演”和“赫赫战功”，

换来了17年的重刑。而作为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的对手“414”的头头沈如槐等人和支持者，有关方面认为他们仅仅是一般缺点错误，后来大部分受到了重用。

笔者认为，文革中，清华大学也好，全国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了争权夺利也好，为了某种观点和信仰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不可能一个是人见人爱的“林妹妹”，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

2004年4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笔者拜读了该书。之前笔者曾道听途说蒯大富和沈如槐早已握手言和，前嫌尽释。令笔者吃惊的是，事过36年后的今天，沈、蒯二位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沈如槐在书中仍然对蒯大富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蒯匪”“死有余辜”……令人大跌眼镜。

在书中，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414”的一把手，派人参与过“揪刘火线”，围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园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些问题，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说，都是与蒯大富差不多的“功劳”。如果历史地、宽宏大量地看待，应当都是“小将”犯错误，都是一般缺点错误。但是，蒯大富可能因为是“天生的”反革命，所以被判刑17年（注：陈伯达才18年。）；而沈如槐可能沾了“414”这三个字的光，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清华大学党委和上级领导果真是清如水明如镜，令人感激之至，鼻涕飘零。

笔者痛骂自己上大学走错了门，上错了船。看看沈如槐老弟，陡然爆发了“红眼病”。本人文革中的“功劳”比沈如槐老弟差远了，真正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文革中本人不但没有炸毁高压线，而且夜间亲自站岗保卫过北航西边的高压电线杆——那是为天安门和中南海送电的。但是，茫茫苍穹下，有阳光普照之处，必有淫雨纷飞之地。后来北航党委“指挥”我厂党委给本人来了个属于“三种人”的“严重政治错误”，由此毁了本人的一生，此为后话。

“死有余辜”的“蒯匪”没有被“414”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而是被“历史老人们”送到监狱里改造去了。有一份小报曾介绍过蒯大富的传奇故事，写他刑满释放之后被山东蓬莱地区私企老板请去当了总工程师，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本书将以“独家新闻”继续介绍蒯大富的故事。

先透点消息，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东风，蒯大富如今在深圳当个体户，办公司，当老板，据说成了不大不小的“大款”，成了地地道道的“款司令”。

~~~~~

【人物追踪】

造访戚本禹

• weihong •

时间：2006年8月23日上午。四当书斋

地点：上海浦东

门在敲过3次后，慢慢地开了。一位老者微笑着开了门，转身朝茶几上一指，爽朗地说：

瓜都切好了，等你们来。

这就是40年前叱咤中国政坛，人称“戚大帅”的戚本禹吗？

戚本禹是靠写文章被毛泽东看中的，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曾出任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代理过中央办公厅主任。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后，政治局瘫痪，中央碰头会主其事，戚本人在中央一度排名前十。他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曾使囚禁中的刘少奇失态。1968年初，毛因种种考虑，将戚隔离审查。1983年，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其时已被羁押15年。

戚的房子算是够大了。他出狱后还年轻，做了些生意，自己买了商品房。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的中共领导人，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当然也是值得称道的。诺大的客厅里挂着郭沫若等名人40多年前为房主写的字，倔强地显示着主人当年的荣耀与辉煌。

初见少不了寒暄。墨宝是最好的话题，“这些字夹在书里，退书时就留下了，我有不少好画，一直没有要回来，可能让康生他们拿走了。”

“那时中办的秀才们扎堆儿出去搜罗字画吧，是不是受田家英影响？”我想往自己的话题上引。

“我原来就懂一些，田主要是收清人书法”。戚没说几句，戚先生问起了我的工作。我想我的经历只有在北图作社科咨询的10来年他也许听得懂，就如实说了。“1983年，我在写《中国国家书目 历史卷》时，到上海图书馆读书，您回来后，好像也在上图呢”。与出狱的人对话时，一定要用“回来”，免得招人不快。

他随口就是一句：“噢，北图的，在任继愈那里。你们那个姓谭的馆长，大家对他有很多意见，那是个造反派。”他说的是前北图副馆长谭斌，原名谭立夫，文革初他因与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纠葛而出名。

戚先生意犹未尽，“文革初，打砸抢的都是干部子弟。”

我应着：那时他们的老子还没被打倒。

戚先生说得没错。文革初最先从学校造反的是那些消息灵通的干部子弟，而且是那些大干部子女。小干部还轮不到此等荣耀，更别说一般工农子女。及至刘少奇倒台，运动触及到部长一级时，这批人的家长也就成了黑帮，开始的造反者变成了保皇派。况且，泛泛的“破四旧”并不合毛主席要搞文革的本意。“联动”就是这么来的。这些共和国创建者的后代，在文革后都成了各种回忆录中的受害者，只字不提他们开风气之先时的壮举。如今，逢五逢十的各类纪念日，他们之中没有做官发财的，往往会被当作道具抬到摄像机前，顶替已逝的父辈出镜，即配合宣传，又抚慰一下那些孤寂而又落花流水的心境。有好事者为他们起了一个颇为受用的雅号——“红色贵族”。

终于有了开头。想谈下去，必须得到信任，显出对话的资本。戚先生的警觉非常高。

“您应该写回忆录，从现在的出版物看，王关戚的倒台，同情者最少。应该为自己说话，对历史也有个交待。”我没说的是，在现有的文革史中，戚先生的形象属较差的一类，这当然和他资历浅，当时冲在前面有关，他的几篇文章白纸黑字，是铁证。更主要的是没人为他说话。他曾研究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毛泽东有批语“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有人据此拿出《多余的话》向已逝的中共领袖瞿秋白发难，使后者定为叛徒。所以，戚先生的身上常常不止刘少奇一个影子。

“以后再写吧，邓力群不让我们写，他自己的在海外出版了”。

“听说他打印了百十本征求意见稿，我得到了一份。近日中央有个说法，好像和西山会议一起。我觉得，邓力群的回忆录有个要害，就是首次以文字形式，向世人公布邓小平和陈云的矛盾从1982年开始。并明确表示自己属于陈派，遭到邓的多次打压。单从回忆录来讲，这书写得不错。邓力群不承认是他送到海外出版的。”

戚一直抬头盯着我，听我摆活。

“你是拥护毛主席的吗？，如果不是，咱们就谈不到一起了。”

“毛主席是伟人。”我这样回答应该算是怎么想就怎么说。

戚闻之释然。问了我家里的情况。先生到了这年月，还很重视这一套。

“我管了一段谍报”，戚说。

“管刘少文？”

“彭绍辉。”

我得向陪同的来人讲一下彭的大致情况，得说彭和余秋里是中共的两个独臂将军一类的话，噢，还有贺炳炎。依戚先生的说法，文革初年，部队情报系统应由任副总长的彭绍辉分管。刘少文当时是总参二〔情报〕部部长。我忽略的是，戚先生管这一系统最早也得在1967年初，而那时，刘少文已进了秦城监狱。及至1975年放出时，话都不会说了。

“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夫妇，现在的书中，第一线是你在组织。当时毛主席知道吗？”这是很多书中都在回避或推脱的问题。

1983年戚被判刑时，罪状第一条，就是这件事。我当然没提判刑的事。

“毛主席在外地。”戚没有正面说。“周总理参与组织了，连夜召集的会。原来没有夫人陪斗，陈伯达加的，他的目的是要加上王光美”。戚先生等于做了回答。

“王曾经帮过陈大忙，文革初，陈还专门谢过王光美，那时连他可能都没参透主席的心思。听说斗的时候你派人把曾志（陶铸夫人）拉走了？保了一下。是因为她和毛江的关系好？”我说的是曾志回忆录中的情节。近日又有海外新书为证，批斗时，曾志一直坐在一边。

“曾志是毛主席的好朋友呀，哪敢轻易动呀。还有邓小平，主席讲了几次要保，我都派人保护了。文革中的批斗会，中南海那一次是最文明的了。”

“刘少奇是光脚走回家的，还挨了打”。我有点儿不知趣。

无论如何，中南海的批斗会都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次奇观。当有人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中共八大时将七大报告中已有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取消时，刘少奇回答：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比较成熟，而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还在探索之中，没有完全形成，所以八大时取消了。质问者顿时被噎住了。今天看来，刘的回答显得有点迂腐，有点不识时务。但在当时，绝对算是以守为攻的杰作。此后，毛传下话来：今后斗争不再搞面对面。

戚先生没再说什么。“那时我保了好多人，王震还给我写过感谢信，我出来后做生意，他儿子应该照顾我，没照顾；许世友是主席的爱将，我死保他。”

“王军也退了，到岁数了”。我说。王军是王震之子。

戚先生对这个没兴趣。



“我还保过华国锋，主席看他是老实人。这个人保错了，主席也看错了。”戚先生显然指的是40年前那场“政变”，他对毛江情深溢于言表。

2006年的10月6日，是华国锋等人发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南海密捕30周年。凡出版物遇到这一事变时，均称其为挽救中国的壮举。各种中共党史和回忆录中与这次行动沾上边的人物，都在用各种方式争功。

“今年海外有报道说主席另留了一套班子，对华不利，他不动手不行了。怕开十届三中全会，那时他得下台。”

“有文字材料吗？”戚先生显然很看重这条消息，还伸出了手。

“现在没有，两种说法，里面都没有张春桥”。

“这就不对了，主席很看重张的”。戚先生的感觉不错，海外这类的新闻，一般都是无厘头。

“林彪接触多吗？”

“多，林彪绝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他儿子胡闹倒有可能。拿个手令就算搞政变啦。”

“听说那样的条子林彪每天都会写的，叶群周围也有能模仿林彪字的人”，我说。

“林的字我见的多了，那条子不像”。戚说。

“和王瑞林熟吗？”问这话，我有自己的用意。

“熟，山东人，耿直。跟邓小平那么多年，什么都没揭发。我对他很好，保过他。他不像那个逢先知，什么都揭，胡说八道。”

和戚先生对话，以及看了邓力群的回忆录，得出个印象，这些左派文化人很讲究朋友的忠实度，注重哥们儿义气。这也许和中国古代推崇的“士”的气节有关。

“田家英是怎么回事？”来得匆忙，路上只想到这一件事要问，其他都是闲聊。田是毛的秘书，逢是田的秘书，当年兼着毛主席的图书管理员。这时间会自然一些。

戚先生抬起头盯着我，我笑了起来，他也似笑非笑。双方心照不宣，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近日海外大肆报道，田非自杀，而是汪东兴带卫士去枪杀的，还说证人有田夫人董边等等。这一次和李志绥的那本书出版时不同，大陆这边没有回应，也许觉得不值一驳。如同邓颖超回忆录一事那样。

“你是去谈话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呀”我笑着说。尽量想显得轻松一些。

“田是自杀，没有问题。”他笑不出来。“我写了东西在海外发了，没有人反驳呀。”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央限令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接受审查。派去找田谈话的是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他叫上了王力和戚本禹一同前往。谈话后，田在寓所内悬梁自尽。田家英的性格中，激越必然易折，使其难以熬过文革。他少年得志，太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毛的秘书流放的流放，自杀的自杀。流放者，李锐也；自杀者，田家英。

“文革前，你能看出毛刘的矛盾吗？”

“我职位低，感觉不到，我的上级是田，他可能有感觉。我写《为革命研究历史》，主席说好，但缺点是没点名。66年4月主席的谈话，精髓就是指出彭德怀也是海瑞，点了名。田家英整理谈话记录时，把这段话删了。你是做秘书的，根本没有这个权力嘛。”

戚指的是毛在杭州汪庄对陈伯达等 5 人的谈话。毛主席用了几天的时间谈读马列原著的问题，大而化之，云山雾罩，点睛的话只有几句关键词：彭德怀，海瑞，罢官。谈话时在座者中，艾思奇回京就病故了，田家英，关锋，胡绳整理谈话纪要。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程序正义。田做此事，典型的有悖程序正义，如今在各类出版物中却成了义举。

“当时做的太绝了，限期搬出中南海，他可能说了些话传到主席耳朵里了，比如斯大林晚年。”我说。

“田有个大问题，就是他让他哥哥去了朝鲜前线，结果投敌了，反过来还做他工作。”真是闻所未闻，按当时的形势，这快算是通敌了，如果是真的，采取那样的措施，也在情理之中。

“以前的事情有争议，比如 A B 团。到延安以后，没听说在党内斗争中主席要处决哪个人。”我还顺着海外的传言想问个究竟。

“那是因为，顾顺章事件中周恩来组织杀了顾的全家，斯大林批评了。”戚说。这又是没听说的事。

“有处分吗？”我穷追不舍。

“那倒没有，但斯大林的话说得很重。”戚说。在座的接着议论，斯大林自己杀了那么多人，中国的事管得还挺细。

“那也是迫不得已吧，留了一两个小孩，那个女孩认出了人，又被抓了好多人。”我说。

在座的几个人还为此事争辩了几句，其中有人认识留下的那女孩，她居然还活着。

1931 年春，中共中央主管特科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此情报被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密报在上海的周。恩来。周遂与康生带特科成员去顾家，勒杀顾太太在内的 9 名在场成年人，转移了两个孩子。此事近年在大陆屡有书刊披露，有的也曾被封杀。如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的《红色恐怖的铁拳》。

“您的记性真好，应该快一点写回忆录。我看了徐景贤的《十年一梦》，有时都会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一群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在旧机器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前几天我见到艾玲的女儿了，艾玲为书中的事要跟徐打官司呢。”

艾是文革中〔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算是上海在京的耳目，当时和江青以下的诸位文革大员混的颇熟。其夫贺瑞麟为军队情报部副部长，所以徐景贤在书中说她后来和林彪集团联系密切，并暗示张春桥下令抓她时，得到了毛主席的应诺。这些背景我当时得给在座的介绍一下。

“艾玲还活着？”戚有些惊讶。

“活着呀。丈夫去世了，她自己在广州住着呢。徐景贤的书中有一章是说她，真是有面子。”

中共九大的纪录片，最后一个镜头就是艾玲，正面半身，起立鼓掌，有 5 秒之久。至今历历在目。

“（XXX 文选）有人买吗？”戚先生换了话题。

“这次的发行方式和以往不一样，只能新华书店卖。原因有两个方面。”我大致讲了我所理解的文选的意义，出版方式，和收益。戚先生听得非常认真，对几百万套的销量表示惊讶：“他们拿那么多稿费，还故意公布说主席拿了多少。”

“邓选发了 3000 万呢。”

“邓有个大错，躲不过去的。”戚先生说得沉重而决绝。

谈话中间，戚先生领我们到外面一家餐厅用餐，点菜，安排座位，刷卡结帐均由年已74岁的先生亲力亲为，令人感佩。

餐毕，戚先生拿出刚出版的《十家伦佛》相送，“我出书得用化名”，先生半解释，半解嘲。“下午我得去请出版社的人吃饭，出书帮了忙”。

一句几次到嘴边的问题，因怕初次见面不礼貌，都咽了回去。最敬爱的领袖，也最看重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下手？其实答案我也知道个大概，但想听先生自己说。

听说有人问过他。他的回答是：“不知道”。

~~~~~

【书刊评论】

吴法宪突破崇毛禁锢

• 金 钟 •

文革当权的首要人物中，这是迄今唯一出版的一本回忆录。吴法宪在伸冤的同时，揭露文革中高层两派的分歧。林彪一派的失败，是毛支持四人帮打压军方的结果。

为林彪翻案——是好多年的一个话题，对此，我一直兴趣不大。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案发的巨大震撼，至今历历在目。林彪的叛逃和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文革的否定、神话的破产，客观上是无法想像的贡献。但是，林彪作为我们曾经天天祝他“永远健康”的毛的头号帮凶，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向一个那样黑暗残暴的深渊，令人在理性上不能认同对他的任何推崇和肯定。

◇ 一部有诚意的回忆录

最近，有朋友向我推荐《吴法宪回忆录》，说是一本“真正的回忆录”，值得一读。于是花了几天时间，尤其在下卷部份，仔细地阅读了一遍。确实有意外的收获，值得加以介绍。该书有八十万字，近千页，分上下两册，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刊印，吴法宪作序，其女金秋任“特约编辑”。上卷从家世写到六五年空军司令刘亚楼逝世；下卷从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起，v 经文革、“九一三”事件、被捕、公审到保外就医，幽居济南。

一九一五年出生于江西的吴法宪在中共排行中，属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老干部，一直没有离开军界，隶属林彪的四野系统，一九四九年后是中共空军的主要负责人。一九六五年刘亚楼去世后由政委接任空军司令员。文革中因林彪的得势，吴法宪升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副总参谋长，有处理军中要务之权，随后，又成为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与文革中的高层决策。由于空军早被立为全军标兵及其机动地位和林系背景，不少中央高干子弟都钻入空军。飞机常被指定执行一些机密任务，吴与周恩来的工作关S甚为密切。因此，吴法宪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这文革前五年充满激烈斗争和权谋的一名高层现场的重要的亲v者与见证人。

当时这个毛身边执掌文革大权的首要人物今天都已死去，除毛周、林彪、康生、陈伯达外，

所谓“四人帮”王张江姚、林彪“死党”黄吴叶李邱，现存活者只有邱会作（一九一四一）一人。这些人物留下回忆录而迄今可见者，惟有吴法宪（邱会作二〇〇一年曾透露写成百万字回忆录，要等他死后才让出版）。吴法宪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可以想见，现任美国的大学副教授、一直在研究林彪问题的金秋女士，必有一定的协助与影响。吴法宪虽不是秀才一类，但数十年军旅生涯，主责政工，自非一般等闲之辈。他在序中称，早在一九四五年（三十岁）就与妻子相约，将来有机会“写点东西”。他说写回忆录，我早有此意。虽然，隐居济南，仍有限制，无法查阅必要的官方档案，但有亲友来往，阅读国内外出版物的方便，这给他写书不无助益。

以吴法宪这样与中共兴衰共荣辱数十年的丰富经历，记忆中储存数十万字的故事，应是不在话下。虽然史实可以留待印证，但读来感觉是平实可信的，有诚意的。至少作者遵循了回忆录一条重要规则：只写自己亲身经手的事与人，最大限度提供第一手的见证。

简介说，回忆录花了十年时间，而自序写于一九九五年，作者二〇〇〇年脑中风而瘫痪，估计著作时间大约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间。其后又经过十年，至二〇〇六年才付印出版，作者已于二〇〇四年在山东病逝。

可以从下列几方面，作一些评介：

◇ 自我澄清，判罪属冤案

吴法宪在一九八一年大审中被定罪名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他在叙述文革高层活动后，对此罪名断然否认：“真是天大的冤枉”，指他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完全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指他“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也列举事实，他的所有高级职务都是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签署批准的。还有“诬陷贺龙、罗瑞卿”问题，他承认参与批斗贺罗，但都是在中央给他们定性之后。他接受毛周整贺罗是“失误、违心”，他们就是“反革命犯罪”的指控。

吴法宪一个要害问题是把空军指挥权交给林立果，使其得以组织“小舰队”图谋杀害毛。

他承认私下当林立果面说过“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话，但实际上，一分钟也没有实行过。他说，就连他这个空军司令，甚至林彪要调动指挥空军，都要经毛批准。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他完全没有听闻。林彪“九一三”乘三叉戟飞机出逃，吴法宪一直听候周恩来的指示，是紧急处理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描述的现场周恩来，应该是相当权威的纪录。“九一三”事件十天后，他便成了阶下囚。他回忆他和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四大金刚”被捕时的情景，别有戏剧性。周恩来主持逮捕，宣布“停职反省”的决定后说“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有人照顾，老婆孩子只管放心，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然后周和叶剑英等同四人“紧紧握手”，好像老友话别一般。

一九七六年毛死四人帮被抓，吴法宪以为五年的拘禁审查可以结束了，不料反而被关进秦城监狱。尤其令他不解的是，他在中央和汪东兴“无话不谈”，现在汪成了副主席，他却下了大牢（据说在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要释放黄吴李邱，为复出的邓小平断然拒绝）。以吴法宪自述而言，他的判罪主要因为是林彪的爱将所致，他在文革并无重大的独立犯罪事实，而是狂潮中的一个执行上级意旨者。他对个别行为的错误也有坦白的反省，例如武汉事件后批斗陈再道，他当众打陈一耳光，受到周恩来的责备。

◇ 揭示真相，为林彪辩护

这是回忆录中份量最重的部份。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吴法宪提出一些新的论据：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是公认毛刘分歧的起点，林彪在会上作了一个吹捧毛的肉麻讲话，为大跃进失败粉饰，强化了毛的极左路线。吴指出，林本来是不想讲话的，但有一些维护毛的干部一直怂恿林出来讲话，如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被鼓动起来“你们要我讲，我就讲”。讲后林彪又说：他那么讲是“出于无奈”。

吴法宪又揭露说，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秋的一天和吴乘车时，告诉吴说，毛在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曾问周，“把刘少奇拿下来后怎么办？”周说，“只有林彪代替刘最合适。”毛同意。遂命吴派飞机接林彪到北京。当时，毛开列的中央副主席是林与周恩来二人。周圈阅时把自己划掉，林便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毛与林彪为甚么从接班人变成死敌？吴法宪对他观察的林彪，作了系统的回顾。他不否认是林的老部下，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但“林彪生性孤僻，从不拉个人关系。”他们见面，从来只谈工作，不谈别的。毛林分歧凸显是六九年中共九大前准备政治报告时，陈伯达的初稿是根据林彪的意见起草的，但被毛江推翻，改由康生、张春桥再起草而后通过。吴法宪说，这两稿的分歧，反映林彪对毛的文革路线认识还有差异。毛就是一味主张阶级斗争，林和陈伯达还是主张要发展生产力。陈由此而倒台，毛信任的是江张姚一伙文革派。

在九大二中庐山会议（七〇年八月）上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吴明确表示，他和林彪的接触中感到林所说“十亿人大国没有一个元首，名不正、言不顺”是“出自内心，也合乎情理”，林没有“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他认为国家主席是虚职，又要头露面，林彪根本不要去争。以此指林抢班夺权，没有根据。

实际上，连周恩来、汪东兴都主张设国家主席。吴还澄清，过去都指责叶群的说法：“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是叶对吴说的，其实是程世清向吴转述的汪东兴的话。二中期间，几乎一边倒地同意林彪的讲话，要修宪设国家主席，使张春桥、姚文元很孤立（竟跑去毛处，跪下抱住毛大腿，哭湿了毛的裤子，求毛支持）最后毛一言定局，设国家主席免谈，要批判陈伯达，指吴法宪等人是“军事俱乐部”。林则要吴不要检讨。吴说，这是林彪建国以来的一次大败仗。

二中之后，林彪就很少讲话，很低调，闷闷不乐，吴没有听到林说过对毛不满的话。直到“九一三”逃跑。对“九一三”事件的原因，吴没有作直接的解释，只是写了他知道的事。最重要的是毛八月中开始的南巡。吴写道，毛的行踪，中央纪律规定，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但毛外出常要派飞机送文件，送人，这是他管的事，因而，也会知道一些毛的行踪。这次南巡，吴只感到毛在搞串连，不知道是针对林和他们几个军头的。直到他八一年保外就医时，才知道毛南巡的具体内容。

吴法宪指出，中央审查他的结论，也认为他和“九一三”事件没有任何牵连。从书中所述文革初期至“九一三”事件，毛林分歧的演变事实看来，毛林已分为两派，毛倚重江青康生四人帮，极力推行毛的斗争路线，林和陈伯达及几名将军则在主张相对缓和的路线。毛和文革派眼看九大后林陈派有坐大趋势，又有军方背景，便意欲击败之。林彪洞悉危机之后，知道不可对抗，只有外逃，无路可走。

◇ 透露攻台计画与高层秘闻

吴法宪回忆录提供了一些他知悉的机密材料，当然，我们不能判断达到何种机密程度。例

如，几次提到中共高层的攻台计划：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拜访斯大林，当面提出中共中央准备以一年左右时间，组建空军以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军援。一九五〇年，毛要求空军尽快准备二百五十架战机和组建一个空降旅，训练伞兵，参加解放台湾战斗，后因韩战爆发，已准备到位的空军便转而投作抗美援朝。在韩战中中共空军有十二个航空师参战，损失飞机数百架，苏军有五百多架投入。全国捐献运动的款项，可买三千七百多架歼击机。

空军建军十多年中，吴透露，每年都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而苏援巨大，“给了不少飞机，派了不少专家”。

另外，有些高层秘闻亦属首发。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名靠中共文革小组发迹的极左秀才，野心膨胀，不可一世，要掀军内一小撮，甚至要倒周恩来，康生。于是毛批示，要将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著倒台，何故？吴法宪透露，原来是“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戚以为江青宠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驸马。周恩来承上旨，立即在碰头会议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命谢富治等当即执行。戚刚到会场，卫士一拥而上将他铐起来，戚竟说：“开甚么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车时，还对姚文元说：“请你代我向江青同志问好！”这般丑态，令人哑笑。江青不仅要拿掉戚，连戚的老婆也不放过，还要吴将戚的两个幼子送去偏远的青海机场。吴法宪说，“反军”的责任，根本搞不清，王关戚只是替罪羊，没有江青支持，他们敢为？

这类插曲还不少，不必一一列举。

◇ 逐渐看清毛的阴险可怕不择手段

中共高层的残酷内斗，几十年来，都不曾动摇他们的正统，不少高干被整得九死一生，一旦复出，又高呼万岁，皇恩浩荡，再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邓小平深知权力独断之害，可他成了太上皇时，又无耻炫耀：“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能作深层反省者，少之又少，吴法宪可以算一个。他的回忆录以事实为据，毫不隐讳地斥责毛和周，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

吴在书中澄清“诬陷贺龙与罗瑞卿”问题时指出，贺罗专案组都是周恩来负责，许多案子都是经毛周亲批、圈阅、定案的。他认为，刘邓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受迫害，“毛泽东周恩来应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此话并非推论，而是知情之言，因为中央那些可致人于死地的专案组的负责人与成员，全由军委办事组从部队选派，而吴是军委办事组主要领导人，了若指掌。如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之罪，是在会议前夕，专案组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一份材料，仓促定案的；而彭德怀的定案，也是“应该由毛泽东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现在却成了黄永胜的“反革命罪行”。

吴法宪对毛整陈伯达也非常反感。毛在庐山会议上说，与陈“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吴说，他与陈伯达相识多年，知道他为人胆小，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文人”。在毛身边三十多年，帮毛拟了不少重要文件、讲话，怎么有了不同意见，就竟然说从来没有配合过？他指毛“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

毛甚至这样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法宪说，其实，陈在中央像个小媳妇，康生、江青可以随便骂他，林彪这边的几个军头比较尊重他，他便同他们靠近，毛对此很不高兴。这是毛打陈，“分而治之”的原因。

回忆录揭示，文革高层自“九大”后逐渐形成两派：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王张江姚四人帮

为主），林彪为首的军队派（黄吴叶李邱为主）的背景：初期天下大乱，毛依靠军队收拾局面，军方自然坐大（九大代表、政治局中军人都超过半数），林彪威望随之升高，毛不能容纳，打陈实即打林。毛是坚决支持江青一边的。军头们从毛整陈伯达开始，看透了毛整人不择手段的本质；从毛支持江青，也令他们对毛的正义、崇高开始动摇。吴法宪说，文革后，都说毛生前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与斗争，江青在大审中予以否认。吴指出，毛确实没有一个批示批评江青的。毛对尼克松不点名批评林彪反对中美谈判，也是没有根据，“是极不负责任的”。毛动辄要人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其实，他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他以所见和亲 v 的结论是，“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

至于周恩来的评述，著墨不多，但看毛的脸色行事，只讲党性，不讲原则；顺从江青，讨好康生，以其高度的组织能力和经验自恃……周的这一切，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想见，如果周在毛之后主政，可以相当务实，但政治上与毛分道扬镳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的感想是：指控林彪九一三出逃，是叛党叛国，那只有一个前提可以成立，就是这个国这个党是尊重人权的。如果这个党国将令你死无葬身之地，任何人的逃亡都值得同情，不论是林彪，还是刘少奇、王明、马思聪。至于林彪逃亡后的株连，管有权力斗争成份，但毫无疑问，都是毛王朝的余毒所致。

□ 原载《开放杂志》2007年四月号

~~~~~

#### 【痛定思痛】

什么叫“群众专政”？

• 邵燕祥 •

我第一次听说“群众专政”这个新名词，是在1968年夏天。那已经是“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周年。

◇ 山雨欲来

有关文革的文件，都说这次大革命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形容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常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这铁拳轻轻一挥，早就把我打倒了。1957年反右派是一回，当时我应声倒地。到了60年代，毛泽东主席两次对文艺界的批示下达以后，我因还厕身于文艺界一角的一个剧团里，虽非首当其冲，但那铁拳的阴影分明又在头顶上晃动，在所谓“（文艺）小整风”时，因剧团实行“政委制”而新从军队调来的政委，就决定先拿我开刀。对我的革命比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提前了两年。

因此，我虽不知道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却对这一场必将到来的暴风雨是有精神准备的，不像1957年时在一片整风鸣放声中忽听一声断喝——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这是为什么》，感到有如晴天霹雳，真的不知道：这又是为什么？

但经过反右派斗争后八九年间的思想改造，反复学习毛泽东著作，自以为粗通了《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等理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是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它“给”属于“人民内部”的人们以各项民主权利，而对“人民”以外即“非人民”则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这一革命理论，使千百万人，包括反右派斗争以后的我，经常陷入“欲做人民而不得”的处境。我们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恐惧就是怕从“人民”划出化外，而化外之民，归诸另册，就是黑五类、敌人、反动派。有此威慑，后来受到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也算得是一项宽大处理，应该感恩戴德了。

所以，从文艺界小整风，到1965年秋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感到山雨欲来的气氛，尽管根本不知道姚某的文章有那么大的来头和后台。其后的“二月提纲”啦，“五一六通知”啦，当年都未公开发表，只是在高层，随后逐级在党内传达的，我辈并不知道。但公开的报纸广播中，火药味一天比一天浓烈了，在每天以读报为主的集体学习当中，谁能没有不祥的预感？毛泽东指责过所谓胡风分子们时时“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但对“人民内部”的人，他不是又不断提醒要关心国家大事，听了什么要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吗？像我这样临渊履冰，辗转在“革命”和“反革命”边缘的人们，不须林彪指点“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也能感到政治气候行将多云转阴，并有暴雨大风，风力八九级间十级，这点敏感是历次政治运动训练出来的。

无怪毛泽东重视舆论动向，他本人就一贯善于造舆论，利用党报发号施令。这回又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发难和动员，一下子把全国纳入准战时体制。正像毛泽东说过的，也是整个文革过程中到处朗读以长革命志气、灭敌人威风的经典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像我这样明摆着的“地富反坏右”之流，在第一时间便置身火网之中。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8月5日，是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定调的。在这之前，运动初起，各级党委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打外围”为务。成立了各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首先是打击牛鬼蛇神，也就是历次运动中已经“定性”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原来内部控制的各种政治、历史等问题的嫌疑人，也就是“候补地富反坏右”。这时，显然是按照历次运动的惯例，“发动群众”，组织斗争，驾轻车而就熟路。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无疑。

就我的个人经历看，在8月上半月开了批斗会，8月下半月收进不许回家的“政训队”（几个月后我从隔离处所出来，才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关押点，约定俗成地叫“牛棚”）。第一天进去就向我宣布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十项规定》。“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就是我的政治身份了。

记得50年代学习时，曾见斯大林批判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的观点。那时不在意，也就没有深究。如今专政临头，不免前思后想，既然这个名为人民民主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而按照民主集中制“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全党又是由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的，那末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是等于中国共产党的专政，而且等于领袖也就是毛泽东的专政，难道不是吗？逻辑的力量是如此地执拗。一切光荣归于共产党，一切光荣归于毛泽东，正是因为他们执掌着全国的政权，统帅着全国的专政机关——“国家机器”啊。

#### ◇ 以革命和群众的名义

到了1968年，我第二次进入文革“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认为讨论或计较自己和别人所受到的专政究竟是“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乃至“领袖专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近于烦琐哲学，把心思用在这上面，真的无乃过迂乎？



因为人家说一句“专你的政”，你就被“专政”了，你还问是以什么名义不成？要问，也好回答，“以革命的名义”嘛！

“以革命的名义”，不是随便说说的。上世纪60年代初，公开中苏分歧，进行“反修”论战之后，文艺界也要配合斗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率先排了一个苏联剧目，就叫《以革命的名义》，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剧中以列宁和捷尔任斯基为主角。除了这个剧名以外，还有一句台词也在演出热潮后广泛流传，那就是“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出自剧中列宁之口，后来有学者翻查列宁全集，没找到应有的出处，也许是剧作家“代圣贤立言”吧，那也无妨，总之叫大家牢记革命传统就是。

这次的“牛棚”不叫“政训队”，而叫“专政队”了。上面由军管小组领导下的“大联委”（机关内的群众组织“大联合”的产物）管着，具体执行单位叫作“群专办公室”，什么叫群专？就是“群众专政”。

什么叫群众专政？

群众专政跟平常“四个念念不忘”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异同？

我先是以为，如1966年“政训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许回家的“全托”，眼下1968年“专政队”实行“群众专政”则是早八晚六的“日托”或“走读”，因是“群众”云云，较为松动一些。后来发现是我错会了意，原来本机关也有十来个“重犯”是由群众专政办公室实施全天候关押的。之所以放我们一码，其实是技术性的原因，因为经过两年多的运动，专政对象大大扩充，一时没有那么多留宿的床位罢了。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称的国家机器——“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是“军队、警察、法庭等项”。看来，群众专政是军队、警察、法庭等（与法庭相联系的还有监狱）的补充。毛泽东在那前后发布过一条“最高指示”，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每个基层，如工厂、矿山、工地、学校、商店，不能一一都派驻军警、设置法庭和监狱吧？落实专政，就只能依靠那里的群众，作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耳目以至铁拳。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党专政或领袖专政时，“以群众的名义”：这样想想群众专政的由来，似乎是于理可通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语汇里，“群众”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词，其含义大体与“人民”相当。这在国、共政权嬗变之际，对比十分明显。国民党一般少说“人民”，多说“国民”，或如文言只用单音词“民”，大陆电影《海霞》（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中，有一个国民党特务潜入大陆，只因说了句“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就让保持高度革命警惕性的群众识破了。同样的，“群众”二字，国民党也不大说，他们爱说“民众”，而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政治刊物，就命名《群众》。

在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方法等方面，强调“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跟唯物观点、辩证观点、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并列为“五大观点”，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实践的引申，都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换句话说，干革命离不开人民群众，必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此就要大力做群众工作，军队到哪里，“群运”干部打前站，号房子，备粮草，保证军民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在平时也不能脱离群众，而要密切联系群众，以至依靠群众，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号称党的优良传统的“群众路线”。

这一整套，是从十年内战时期的苏区和红军工作，以及白区工作的成败中总结起来的，到延安整风前后已经堪称完备。

这里，要说到“群众运动”。可以说，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在农村，是农民运动，在城市，则是工人运动和青年（主要是学生）运动（工农红军的主要兵源也是来自农民）。

与共产党的革命史不可分的，中国的农民运动，从苏区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和“扩（大）红（军）”，到40年代后期内战中在党所控制地区的土地改革、参军支（援）前（线）等，都是通过发动群众，以运动方式实现的。中国现代的工潮和学潮，也是作为“第二条战线”，策应了第一条战线上的武装斗争。

在中国现代史上，广大城乡的群众性风潮，除了个别的自发行为（多半是短命的），凡能成些气候的，多是由共产党领导或参与领导的。

“领导”和“群众”，是中共革命结构中的一对基本范畴，党是群众（首先是“基本群众”即工农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了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才从“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工人才从自发状态进入自觉状态，工人人们的抗争活动才能摆脱“工团主义”，从经济斗争跻身政治斗争。农民运动也是一样，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时，只能是分散的抗粮抗税或个人的、家族的复仇，顶多像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那样“拉竿子”，上山落草，劫富济贫；有了党的领导，才能作持久的有组织的斗争，把农民引向超出小生产眼界的远大目标，使这支力量纳入夺取政权的革命。

在共产党发动的革命中，若不想成为革命的对象，必须承认党的领导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说过，要树立领导权，必须给被领导者以实际的利益。除了像“分田分地真忙”能让贫苦农民享受到胜利果实以外，毛泽东早在苏区时期就号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是在战时的后方，在相对和平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

“党群关系”，作为领导者的党与被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国内阶级关系总格局中最基本的关系，要做到全民“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的领导权就巩固了，政权也就可望长治久安了。这个党群关系是由若干具体的“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以至“官兵关系”组成的；由于“群众”除了与“领导”对应的一义外，还有“非党”即“党外（人士）”一义，因此，党群关系也还有党与统一战线中一定时期盟友（主要是一些政派的上层人物）的关系这个方面。对于后者，共产党以“有联合，有斗争”来“求团结”；而对于前者，即中下层的群众，毛泽东提醒，要“站在他们的前头”，不能跟在群众的后面跑，那就是“尾巴主义”，右倾的表现了。

1949年“进京”以后，以李自成成为戒，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是枪杆子不能丢，继续进军东南、中南、西南、西北，二是群众运动不能丢，在新解放区城乡建党建政，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剿匪反霸，组织“工、青、妇”和“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以巩固党的领导权。

在1950至1951年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三大政治运动，和与此相应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构成国内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无不是通过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社会动员完成的。群众运动不仅是共产党革命时期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而且成为建国后长时期的主要执政方式。国民党以特务治国，大家深有体会，共产党以群众运动治国，使人耳目一新，这是亘古未有的大场面，身历其境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如在镇反和肃反中，据说实行的是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远胜过苏联肃反时的单纯依靠“契卡”或内务部专业人员，说他们那里不发动群众，容易造成错审错判；而我们这里，由于发动群众，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大胆怀疑，揭发检举，家人亲友，概莫能外，令一切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特别是在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和由此引发的内部肃反（全名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不同规模的大会小会，会前会后，党组织指定的“五人小组”，率领“革命群众”代行了公安局和法院的职权，对审查对象进行预审，调查，“逼供信”的情况不一而足；对部分审查对象加以关押，机关宿舍或办公室代替了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这种名为“隔离审查”的方式，是为了防止串供，早在“三反”“五反”时就已实行，所谓的“小老虎”或可回家，“大老虎”和相当一些“中老虎”都是关起来的。当时的进城老干部，对这种“关禁闭”的做法习以为常，而新干部和留用职工，甚至一些遭到“隔离”的对象及其家属，虽不习惯，却还往往认为关在单位里比直接关进公安局或法院好些，这是以不管有罪无罪，反正要关押为前提，不得已而求其次了。

这些完全游离于法律程序之外，连起码的程序正义也没有的“私设公堂”或“公设私堂”，即使在只从戏曲、评书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人，也会一眼看透，为什么竟能够在光天化日下公然风行？就没有人质疑吗？如果在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社会里，一般人头脑中充斥着的是“清官”“好皇帝”的臣民意识，那末，不是还有受过现代法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吗？但是，这些人如果不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呼吁建立和健全法制，平反冤案，实行“无罪推定”等而罹祸，就是早在反右派之前已被清除。1949年的划时代巨变，“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必须打断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的“法统”，废除包括“五权宪法”、“六法全书”在内的“国民党的全部反动法律”。一切具有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人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天翻地覆慨而慷”，原有的执业律师失业了，原有的法学教授们下课了。为什么直到文革结束时，建国27年只有一部新婚姻法？至少在文革前的17年间，并不是毫无立法的能力，关键在于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也就是所谓“无法无天”的意思吧。

因此，在土改中，各地基层组织贫苦农民开会斗争地主后，如工作队上报某些地主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般也只需经县一级土改工作团批准，就召开群众大会，以人民法庭或革命法庭的名义来公判，立即执行。

如果说这是非常时期的特例，那末，到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在司法部门之外的枉法行为，是以遍及全国的空前规模出现的。前此的政治运动中，以“隔离”为名实施非法关押已如上述；而从1967年起，因毛泽东夸奖“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那里得到解决”，于是大办学习班的经验迅速推广。从首都到地方，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实施封闭式集体关押，有时竟至多达上千人，长达几个月。省一级、市一级，以至各工厂、学校等大大小小的“学习班”里，不但搞“逼供信”，而且搞体罚肉刑，不知多少人致死。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一次私刑审讯后坠楼而死，至今也弄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这样的疑案不知凡几，举这个例子只因是名人之后，经常会成为话题。

那时候的宣传，说要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就总怕是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模式，为雏型（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称为“学习”的，就像运动中开谁的会，迫其检查交代，都是说“帮助”他一样）。

现在人们有了初步的法治观念，懂得一切个人和社会团体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或者还进一步懂得了现代法律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准绳。每个公民都有诉诸法律的权利，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标志。哪一个公民个人能够那么轻易地发动起群众，诉诸“群众运动”呢？

多年来，尽管主流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归根结底是无产专政的工具，而且也确实通过制订一些法规性的条例（如文革中的“公安六条”），并据此“依法”杀害了诸如林昭、陆兰秀、遇罗克、张志新等对文革提出异议或质疑的人，但直到文革结束前，也就是毛泽东去世前，似乎对法的重视始终不及对群众运动的偏爱，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法律程序麻烦讨嫌的心理，还是各级干部靠运动办事已成习惯定势？抑或如林彪的一句名言，“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因而也就是合法的？而群众运动的进退又不是不能操控的，一呼百应，何乐而不为呢？

#### ◇ 到毛泽东思想中找渊源

这样的解读，怎么看，都好像失之肤浅了，而且失之臆测。

还是到毛泽东思想中去找深层的渊源吧。

不能说毛泽东对法不重视。早在1949年新政协刚刚开过，《共同纲领》中明确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时，他就说，“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同时，他也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内部”的一部分），在他指认的“国家机器”中就包括了“军队、警察、法庭等项”（《论人民民主专政》）；而且，1957年初，他针对两条当时的“反标”，义正辞严地说：“‘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宪法赋予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以合法性，赋予社会主义制度以合法性。这是毛泽东郑重其事的指导性发言，跟作为笑谈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不可等量齐观。

然而，我们从另外一些他的重要讲话中发现，与毛泽东的民主观和专政观相联系，这个从学潮（长沙的“驱张运动”）、工潮（如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和湖南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出身，而不是从书斋走向革命的领军人物，他视一切群众自发的活动为革命的温床，又一心要领导群众通过运动达到预设的革命目的。在他那里，革命和群众运动，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无法截然分开的。因此，在他那里，革命的群众运动既体现了占人口多数的“民主”，也体现了革命群众这个大多数对革命敌人、反动派那个少数的“专政”。这不是完全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通则吗？

这样，可以说，革命，革命的群众运动，既实现民主，也实现专政；甚至可以说，革命和专政也就是民主了，民主也就是专政，套一句流行的句式，民主和专政是一张“人民币”的两面。

一度成为话题的“大民主”，这个政治学以外的概念，也可从这里索解。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到这个问题：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在这里，毛泽东拿来批判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还只是“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到后面却变成了波、匈事件那样的“上街”，“闹事”，“乱子”，他说，在中

国，“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也就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于是，毛泽东指出，“如果有什么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应对“他们”的大民主——也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波、匈事件式的或称“哥穆尔卡说”的大民主，——毛泽东也说大民主，针锋相对并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无产阶级大民主之说。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同上）

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整风，什么思想改造，什么民主，什么专政，既表现为革命的群众运动，也就都是阶级斗争的同义语。以学校为例，学生自然是“群众”的主体，也是“革命”的主体，发动青年学生设卡，决定放大学教授过关或不准过关，在1951年的高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就是这么干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和1958年以“教育革命”为名的“拔白旗，插红旗”对教师进行的批判斗争中，也是这么干的；到了文革初起的1966年，发动青少年学生斗争“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大中小学教师，更把这份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推到血腥的极致，所谓“红八月”就这样从学校推向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假手于青少年，假手于基层的一般群众，也许这就是初始的“群众专政”的由来，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做出这样的概括和命名。在第一时间，我们就看到了到处张贴的“红卫兵”这第一号“群众组织”超越法律的，充满“格杀毋论”的“勒令”。

如果不追溯到更早的时段，仅就红卫兵起的“狂飙”时期来说，他们按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做法加以继承和发扬，正是典型的“群众专政”，也正是无法无天更无理可讲的“暴民专政”。

这样的专政，跟“无产阶级”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倘有，那就是他们听命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起初是打校长，打老师，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后，就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明示暗示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前者们则继续当作“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会基础打。

1966年8月18日，史称“八一八”，毛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戴上由他题写“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并对一名名叫“彬彬”的女红卫兵说：“要武嘛！”这一句金口玉言，使后来所有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诉求为之失声。

从这个“红八月”，到第二年以海“工总司”夺权为标志的“一月风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响亮口号下，已经不仅是少不更事的红卫兵，而有更多的青年以至中年到处组织大大小小的战斗队、兵团、司令部等“群众组织”，真像是群雄并起的景象。而不管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众组织之间，怎样对立，怎样厮杀，他们异口同声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誓死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在“炮打司令部”把刘少奇从第二号打到第七位的那次会议上，通过了习称“十六条”的文件，针对刘少奇等在运动初期套用反右派斗争时的经验压制群众保护党委，特别强调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这完全符合毛泽东一贯主张在运动初期必须反右，才能充分地更是“放手地”发动群众的领导方法。6月初，毛泽东批示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给北大党委贴的大字报，其中就说：“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用1957年时的标准，像这样以群众的名义公然向党委挑战，自是右派言论、右派行径了。而这次居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誉为“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却是伟大领袖在战术和策略上的又一次首创。果然赢得了“群众”们的拥护和响应。6月18日，北大搭起“斗鬼台”，对几十人乱打乱斗，大概也属于群众的首创精神吧。

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群众的发动，是借用了四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这次他不是选择“痞子”，而选择了天真烂漫一心跟着他干革命的青少年来当“革命先锋”。青少年们从他早年“考察报告”传授的经验中，懂得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革命道理，学会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狠劲，以及“戴高帽子游乡”等技术层面的细节；而甚至被打倒的干部和群众，也从中体会到应该“正确对待”群众和革命群众运动，为了革命“矫枉必须过正”，对出乎想象的过火行为，也应该说“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既不该“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也不该“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总之，逆来顺受就是。

而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面对的另一种选择，“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此时此刻，自然非毛泽东莫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史实。

#### ◇ 史无前例与史有前例

歌颂文革伟大时，说它“史无前例”。其实都是史有前例的。1957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是文革“四大”的前例，不过，当时的四大是“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而被目为“实际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却是替无产阶级司令部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受到鼓励；再远一点，“湖南农民运动”就是前例，如文革“破四旧”之于当年的打菩萨，不仅如法炮制，而且青出于蓝，包括强制僧尼还俗，结婚成家（我们九十年代到某名山某名寺，那里能干的方丈被当地人呼为李会计，就是他文革中在生产队的身份）。

“四大”毕竟是口诛笔伐，虽说刀笔杀人不见血，但发展到大标语上“砸烂”、“油炸”，也不过一时快口，近于“务虚”；到了现场揪斗，“坐喷气式”，铅丝挂牌，以至各样的触及皮肉，就是“务实”的功夫了。一发而不可收，发展到“打砸抢烧杀”，私刑拷打，草菅人命，便更像前现代的农村械斗，绿林剪径，匪来如荆，兵来如（莠字改竹头）。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政治上打击地主”的大事一节，有个行动叫“枪毙”，其中说：“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

派的恐怖景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几年来训练得善于“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们，在从事“红色恐怖”的时候，不正是从这里获得了权威的理论根据和有力的精神鼓舞吗？

再套一句法国大革命时的名言：群众，群众，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当时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曾经把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指为有些“长胡子的”、“摇羽毛扇的”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时则有比较清醒的人补充说，整个的运动当中，无非是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加上群众斗群众，干部斗干部，至于是谁“挑动”的，没说。这样的表述，自然是上不了书的，因为这里抹煞了文革意识形态中第一义的敌我界限和阶级界限。

当时传达过毛泽东一句话：“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虽说不知上下文所为何来，但努力求解，这与他针对民主人士的批评而说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精神上是一致的。但这样七斗八斗，势必把事情搞乱，然而毛泽东不怕乱，主张要“乱够”，要从“大乱达到大治”，他把大乱当成大治的前提，这也符合他的革命逻辑，即先“破坏一个旧世界”，再来“建设一个新世界”。不过，这次对群众的大发动，颇有一点易放难收的架势。原想三五个月见眉目，半年一年见成果的文革不得不拖了下来。现在一般持文革十年之说，也有人认为到1969年“九大”，为时三年，文革就算结束了，以后则是文革后“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成败。以三年论，驾驭运动，分别对付各派各系的干部和群众，对付各阶段的敌我友，也真费了毛泽东纵横捭阖的功夫，极大地消耗了他晚年的精力。

群众运动，像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运动一样，运动状态就是不断变动变化的状态。自然界如此，社会运动也如此。通观1966至1976前后十年，许多人说“跟不上”，就是跟不上这个变化，座上客成阶下囚，副统帅变叛逃者，且不说下面的小角色，更是命运无常。拿所谓群众组织来说，虽说蜂拥而起，仿佛风云际会，其实从有后台而“通天”的，到自发有如“乌合之众”的，都没有逃出一个巨大的掌心，依附性大于独立性。今天支持你，你就是左派，明天不知为什么不支持你了，你就成了反动。今天施暴的主体，明天也许就成了施暴的对象。红卫兵上山下乡，还算是软着陆，大撒网抓的“五一六（分子）”，不都是最早最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么？于是有些群众（群众组织的头头也算群众）叹道，群众运动原来是运动群众，消极了，退出了，有的逍遥了，有的还不得逍遥。

有人迷惘，有人抱怨，以为上当受骗，其实大可不必。毛泽东对文革的领导，根本战略从来没有变，一切因应时势的灵活机动也都是为了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这一切都曾先后公开宣布过。因此，正像他在1957年将党内整风转为全国性反右派斗争时说的一样，这是“阳谋”。在毛泽东主席掌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为了巩固以无产阶级司令部为首的党的领导，一切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真刀真枪的战争中，固然要抛头颅洒热血，在保卫政权不变色的文化大革命中，牺牲也是难免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嘛！在狂飙般的群众运动中，“群众专政”专了群众的政，也不必大惊小怪，对此不解以至不满的人，特别是曾经作为群众专政的主体，却又沦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因而想不通的人，作如是观，便应以顾全大局为重了。

由于回忆“群众专政”这个提法（我初识之于1968年），追溯其源流，发现它的内涵极其丰富，外延极其广阔，它几乎贯串了夺权和执政的各个时期，涵盖了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弄清群众专政的实质，有助于理解建国前与建国后的历次革命群众运动，思考长时期来民主与专政的理论与实践，还有一切与“群众”有关的词语的意义。

我不是做研究工作的。以上说的，只是一些回忆和思索，是直觉和感想一类，聊供专门的

研究者参考。近年来好像出版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研究的著作，我几乎都没有看过。不久前偶然见到一本《毛泽东谈毛泽东》（胡哲伟、孙泰著，中央党校出版社），其中有几句毛泽东1958年讲的话，非常警策，耐人深思，是我没听说过的，因为涉及法律，也涉及群众，转录在下面，以代此文的结论：“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场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